

不知會議主題而來參加會議，文不對題地提交代表，以禮相待而已。有幾位治學嚴肅的國際知名

clans 嘗權，中國音樂的前途有希望嗎？

■

向文壇扔出炸彈的評論家

□白杰明

知識人紛紛自行平反，驚世駭俗的青年評論家再露頭角。

劉曉波再論文壇危機，批評新詩人，並猛轟文壇的幫派現象。

雖被斥為「罵倒一切」，但乃甘作冒險者，孤獨地前行。

向文壇扔出炸彈後，劉曉波已赴西歐，李小山、朱大可也要出去。

曾在去年的「反資」鬥爭中被清洗或受委屈的一批知識人，今年紛紛利用不同的形式和場合「自行平反」。

劉賓雁獲准出訪美國後表示，他並不對以前的言行認錯。劉再復在《文匯月刊》指責極左文人姚雪垠，為去年挨整而反擊。李澤厚在四月間與劉再復對談，表示他是思想界的權威。劉心武從一月起就在《文藝報》撰文，以評論家的姿態確立自己的權威地位。連王蒙這位文化官僚也從二月起就化名陽雨，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企圖匡正文壇流弊。

除了上述人等，一些「沉寂」一段時日的青年評論家也展開了活動，發表文章，表明他們並沒有失去當日驚世駭俗的銳氣。南京藝術學院研究生李小山，會建議中國國畫成為不值得再發揚的「保留

「野心」，但他們還是刊登了劉這篇兩萬餘字的長文。劉在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的《深圳青年報》會發表《危機》一文。這次再論危機，被《百家》放在一個別出心裁的欄目——「第一百零一家」。

劉的這篇文章，較他以前的文學評論在辛辣程度上有增無減。他首先集中火力猛攻如雨後春筍一樣出現的新詩人。他說，「誰手中有幾本外國現代詩集，加上一點文學修養和『懷才不遇』的感傷情緒和比較強的模仿能力，誰就會成為『朦朧詩人』」。

他說北島是「虛偽的受難者」，他太在乎自己是一個著名詩人了……太拿自己昔日的光影當回事了，太急於通過非審美的途徑走向世界文學了」；而江河「筆下的一切所呈現的既像那些溫柔安詳的大閨秀，又像那些高雅超脫的士大夫」；楊煉則「從來不是一個詩人，至多是一個比較高明的工匠」。他批評了一九七八一七九年的《今天》派詩人：「在近幾年中，由於他們長期被壓抑的內在充實已經釋放出來了，社會的承認、往來於知名人士、外國人之間的上層生活使孤獨不再是他們經常性的體驗，痛苦也隨着文壇桂冠的到來而消散。他們的生命便開始空虛，激情之火也慢慢熄滅，想以一個著名詩人而為文壇、為社會、為大批的文學愛好者創造詩歌模式的非審美慾望開始上升為主要的創作動機。」

儘管《百家》編輯在該刊創刊詞寫道，辦這份雜誌，「我們不無忐忑；我們充滿自信；我們懷着

《百家》扔出了一顆新的炸彈，題為《再論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關於〈危機〉一文的一點補充》。劉曉波於今年一月在安徽省文聯創辦的雙月刊《百家》上發表文章企圖匡正文壇流弊。劉曉波在五月推出一篇清算「反資」以來的文學長文，題為《空心的文學》，宣判「文學的死亡」。還有這兩年文壇最具爭論性的人物劉曉波，也在中共十三大之後狠批新時期的大陸文學，並間接評論時政。

劉曉波·第一百零一家

而為文壇、為社會、為大批的文學愛好者創造詩歌模式的非審美慾望開始上升為主要的創作動機。但劉曉波的波及面遠遠地超出了詩人羣體。他批評說：「我是詩人、我是小說家、我是導演、我是演員，我們都是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金像獎

文藝生活

九十年代月刊 1988年10月

內蒙草原騎駱駝

●文藝生活

□施叔青

的候選人。」這種瀰漫中國當代文壇的呼喊聲，常常使我想起乞丐那哀求的目光。而又正是這些人每天都以喋喋不休的所謂文化意識、歷史意識來表示自己的民族尊嚴。當你目睹了這一切，對當代文壇還能說什麼？」

劉曉波早就對大陸文壇的幫派現象有反感。他說：「中國文壇上拉幫結伙的現象太普遍了，誰如果沒有個『圈子』，誰就寸步難行。而在實際上，作為一種純個體勞動的精神創造，在文學上最終的勝負只取決於有沒有獨特的、有力量的個體。特別是在中國，『圈子』意味着互相遷就、互相同化、互相吹捧，以至於互相欺騙。總想為自己尋找同盟者。『圈子』是中國知識份子在骨子裏缺乏獨立性的表現，更是個體力量虛弱的表現。可悲的是當每個個體意識到自身力量的薄弱時，不是全力以赴地去充實、激發自己，而是左顧右盼，千方百計地鑽進某個有『名人』掛帥的、可以使自己哪怕是短時期地在感覺上強大起來的『圈子』。」

他在一九八六年的《中國》月刊上曾以「對話」的形式批駁新時期的國粹理論權威李澤厚，並把文章結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在今年中出書。不過出版當局鑑於他的激烈言論，下令該集子「內部發行」，縮小影響，並限量供專家批判。六月，劉書第一版銷罄，當局稱國家紙張緊張，不宜多印此類宣揚文化虛無主義的東西，把書打入冷宮。

在「補充」一文中，劉曉波再批李澤厚和「後理學派」。難怪在四月十二日的《人民日報》上，李澤厚在與劉再復的對談裏面乘機不點名地反擊劉曉波，聲稱「對那種水平不高而又罵倒一切的年輕人要說些話」。原來一九八六年劉曉波頭一次與劉再復和李澤厚衝突以後，他在報刊上的代號就成了那個「罵倒一切的年輕人」。

「罵倒一切的年輕人」

儘管官方對劉曉波有種種的不滿，並把他視為大陸青年人文化虛無主義思潮的罪魁禍首，但他卻恢復了像一九八六年那樣公開演講和發表作品。

今年四月中旬出版的《百家》第二期上，劉又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為《論孤獨》。文章說，知識份子「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使命就是為時代、為民族、為人類提供『超前意識』。知識份子的視野必須在現存的觀念、秩序之外，必須是冒險者，孤獨的前行；他能在盛世中透視出危機的預兆，在自信中體驗到即將光臨的幻滅！」。

他公開發表這種極端言論，還說這種叛逆精神不是可以裝出來的。他說：「這種獨立於整個社會的孤獨決不是有意為之的，而是：一種生理的，本能的氣質。」

劉曉波還駁斥老、中、青知識份子的「互補、協調、三合一」的提法。他主張代溝的展現，冀望這樣可以避免「被中、老年所同化」。

照往年的標準，劉曉波這一類言論早就要挨整了，但意識形態的主管們目前處於困境，因而對劉曉波之類採取了放任政策。七月初，劉曉波在北京師範學院參加博士論文的答辯，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順利通過。

乘風西去

大約半年前，劉曉波收到來自挪威的邀請，先在九月初參加一個當代中國電影與戲劇的國際研討

人要說些話」。原來一九八六年劉曉波頭一次與劉再復和李澤厚衝突以後，他在報刊上的代號就成了那個「罵倒一切的年輕人」。

孤獨的「冒險者」

在以前的文學評論中，劉基本上已經「橫掃」一切。在《啓蒙的悲劇》中，他把「新時期」的改革（由政治到文化）的不徹底和受挫與五·四運動的失敗作比較。他說，中國數次洋務運動都是被動的反應，改革和改良從來不是主動、積極的。他認為五·四的失敗是在於當時的知識人沒有徹底反封建主義，沒有能夠自覺地進行全盤西化。在封建主義遠遠未消除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卻成了首要敵人。二三十年代如是，現今也有這種危險。他說，在三十年代魯迅「那種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深刻、冷酷剖析和批判日漸衰弱，代之以大量無聊的、相互攻擊的雜文：『他』陷於庸俗的個人恩怨和爭當文壇盟主的無聊爭奪中。在早期，中國的大眾是魯迅主要批判對象；而晚期，大眾變成了魯迅的救世主。」

這篇文章的結束語說：「滯留在農業文明中的生存方式的根深蒂固，使現代化的啓蒙屢屢被中斷。因此，立志於成為一個人的國人，必須有付出巨大代價的心理準備，別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中能過上人的生活。否則的話，一旦受挫，又將重演『五·四』的悲劇。」

大陸的文藝評論家裏面鮮有人能拒絕把自己變成社會、政治預言家的誘惑，劉曉波也不例外。但大陸能容忍像他或朱大可、李小山等青年評論家的言論，意味着意識形態的新混亂高潮。遺憾的是，劉已經西去，據傳不急於返國，而李小山快要出去了，朱大可也在躍躍欲試。